

◀ (上接4版)

幢建筑有2排,共9幢楼房,坐北朝南,砖木结构,风格属于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式样,外墙青红砖交错,镶嵌白色粉线,门楣有矾红色雕花,黑漆大门上配铜环,门框围以米黄色石条。第一排5幢楼房沿着望志路而建,房屋落成不久,沿街的106号、108号(今兴业路的76号、78号)两所房屋就被李汉俊兄弟租下,1921年中共“一大”就在106号内召开。

尽管在第三次扩界后的五年内,西门区的建设开发已取得了很高成就,但尚不能将此时的西门区与后来人们心目中繁华、发达的法租界相提并论,更不能与今天的“新天地”同日而语。很多研究者在检讨中共“一大”为何在法租界召开时,常常将法租界的摩登、繁华和宜居作为一个重要论点。但1920年代和1940年代的法租界毕竟存在很大差异。因为1920年代的西门区尚处于草创阶段,不仅道路规划并未得到完全实施,区内的房地产开发也正处于起步阶段,商业机构的数量有限,人口也十分稀少。以“109区块”为例,1920年时,望志路北侧已有一些建筑建成,但南侧还没有盖上房子,还是一片菜地,在菜地的一旁仅有一座庵堂,沿马路西边的房屋也没有建造,仅有一些平房和几家小手工业工场。就像现在上海的市区和郊区的结合部,人烟稀少,地方很冷僻。(陆米强:《李汉俊巧设中共“一大”会场》)。多年之后,随着南侧的开发与建设,整个望志路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至于前来辨认“一大”会址的杨淑慧不知所措,久久不能确定“树德里”的所在。

18 53年爆发的“小刀会”运动,不仅为外国租界的扩张提供了第一次机遇,也为租界当局设置独立于中国政府的警务和司法机构找

到了借口。此后,伴随中国国力的一步步衰颓,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中国当局对租界的警察和司法管辖权早已名存实亡,不仅华界的巡捕、警察无法进入租界办案,就连设在租界内的会审公廨,也被租界当局控制,租界由此变成了特殊的“国中之国”。这种畸形体制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破坏中国主权;另一方面,客观上构成了对抗专制王权和军阀势力的一道“防火墙”。上海租界的存在,无异于在中国的专制权力上打开了一道缝隙。

对革命党人和政治组织而言,租界如同一座“安全岛”。无论在晚清还是北洋时期,他们都会把这里作为首选的革命基地,开展思想启蒙、政治宣传,甚至策划武力对抗等活动。例如,因涉嫌上书李秀成而遭到清廷通缉的王韬就避居租界内,成功逃脱了清政府的追缉。又如“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康有为遭到清廷通缉,也是躲入租界才得以设法出逃海外;1903年,因“苏报案”遭到清廷起诉的章太炎、邹容,也正是得益于租界的保护,才逃脱了杀头大罪,仅分别判处三年和二年监禁。

民国建立后,国内的政治环境并未得到改善,反而由于军阀当道,政治氛围变得更加压抑。“五四”前后,军阀势力控制下的北京,已呈现出政治高压的态势。相对而言,殖民者控制下的上海租界,有很多缝隙可以利用。政治生态不断恶化,大批北方知识分子纷纷南下,使得上海成为宣传共产主义等种种新思想、新理论的中心。

相较而言,在上海两租界中,法租界对知识分子和革命者的吸引力更大。这一方面是受到政治模式的影响,工部局由于不对任何组织负责,所有它的巡捕房可以直接命令巡捕抓人,而法租界巡捕房由于受法国总领事领导,因此任何拘捕行动必须首先获得后者的许可才能执行。另一方面,公共

租界崇尚经济实用的理念,巡捕房更趋于为了金钱利益答应捕人或放人的要求,而法国领事却经常要坚持自己的价值理念,不肯轻易对中国当局的要求做出回应。此外,法租界繁琐的批捕程序,容易为革命党人的逃脱和营救提供机会(张玉菡:《中共建党与上海复兴公园街区》)。法租界的制度设计和价值理念客观上为中国的革命者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当然,我们切不可将此理解为租界当局对中国革命的同情。

法租界能够赢得知识分子和革命者青睐的另一个原因可能在于,法租界警务处(Services de Police)的警力有限,对租界社会,尤其是对新区的控制力不足。法租界的警察力量始建于1860年代,作为法租界公董局最早建立、也是历史最悠久的一个行政机构,警务处在法租界当局的行政体系内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也承担着广泛的职责。在和平时期,它需要担负的责任非常广泛,既包括打击犯罪、政治监控、情报搜集,也涵盖文化监察、风化管理以及城市交通管控等。因此,自该机构建立之日起,就成为法租界当局最为倚重的行政力量。尽管地位如此重要,但警务处一直存在警力不足的困扰。

在法租界完成第三次扩界后,公董局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是如何管控这一面积远大于旧区的扩展区。1915年,法租界总共被划分为四大区块,分别由四个捕房负责日常的治安的维护,分别为:中央捕房(Poste Central)、小东门捕房(Poste de la Porte d'Est)、西捕房(Poste d'Ouest)、越界筑路(Poste Extérieurs)捕房。在这一年,法租界警察的全部人数仅有603人,包括了警官、警员、翻译、园丁、警探、司机等,而此时法租界的全部人口已将近15万人。负责包括西门区在内的越界筑路捕房,仅有警察

101人,其中能够包探人数只有4人,而能够出警的巡捕十分有限。

为了适应租界扩张之后的新形势,加强对新区的控制,1918年法租界警务处调整了警区分布与捕房的设置,原有的四大捕房变成五大,分别为小东门捕房、北捕房、霞飞路捕房(Poste de Joffre)、中央捕房和宝建路捕房(Poste de Poitiers)。原有的中央捕房变成了北捕房,而在薛华立路建立的新捕房成为了新的中央捕房。警察人数增加为732人,西门区被划入霞飞捕房的管理范围,警察人数为145人。其中仅有华人包探3人,能够出警的巡捕人数不超过120人。长期供职于法租界警务处并担任高级职务的薛耕莘坦承,法租界警务处的警力是不足的。因此难以对法租界,尤其是租界内的各种思潮和政治活动实施严密监控。

事实上,法租界公董局在西门区的警力不足,还可以从这一地区频发的治安案件中得到反映。1921年1月10日的《申报》报道:

法捕房包探查得界内贝勒路永庆坊第十八号内私煮烟膏,秘密售烟。1922年11月29日的《申报》报道:法新租界望志路荒地上昨晨发现一具被勒毙的女尸。

1925年3月3日的《申报》报道:

法新租界望志路永吉里三十七号某姓家有余屋一间,前晨九点钟突来盗匪三人,以租屋为由,一拥入内,袖出手枪,劫去衣服现洋等共值五百余元。

现在的望志路一带已经发展成为上海最繁华的地区,今天的上海人恐难想象上述杀人、贩毒和抢劫的恶性案件。然而,一百年前,这里还是环境荒僻、人烟稀少的地段,由于警力不足,租界的社会控制力量有限,难免频发治安案件。对普通的居民而言,这个街区也许意味着混乱、不稳定和危险,但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而言,这又是一块难得的空间,因为最危险的地方也许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作为一个新兴社区,西门区或者说“109区块”附近地区,对当时上海的一些特定群体和社会阶层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这些群体既包括同乡会、学术文化组织,当然也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内的各种政治团体,如“中国各界联合会总会”、“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星期评论》社以及由李汉俊主持的

“新世纪丛书社”等。许多政治人物在这里留下过足迹,包括蒋介石、于右任、邵力子、柳亚子、陈望道和屈文六等。

探究这一街区广受青睐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区位合理、交通便利、房租低廉。

从区位上看,一方面,1920年代的西门区还部分保持着江南农家的景观,人口密度较小,环境宁谧,但它距离当时的市中心并不遥远,无论前往南京路、外滩,还是南市老城厢,步行一小时内可达;另一方面,这一地区早已开通电车,所以即使前往距离较远的虹口、杨树浦和徐家汇等地区,也不会感到不便。因此,对那些既无经商需求,又无上工需要的知识分子而言,这一街区尤其具有吸引力。

另一个优势是房租低廉。20年代的西门区尚处于城乡结合部,区内的房屋又多以中式石库门为主,因此较之东部旧区和西部西式住宅区,这一带的房租相对便宜。据李书城夫人回忆,李汉俊当时租下树德里石库门的价格仅为16元每月,而在相距不远的萨坡赛路以西,租住花园洋房则需要支付约80元每月的租金。

相较于其他群体,职业革命家可能更看重这一地区特殊的空间结构和居民构成。从法租界的空间布局来看,西门区以东是以公馆马路为代表的法租界旧区,商业繁盛,人口稠密,同时也是上海帮会势力的盘踞之地。而西面则是正在兴起的西式高级住宅区,人口密度较小,环境优美。北面紧邻霞飞路,南面则靠近上海著名的棚户区 and 法租界工业区。因此,西门区就成了法租界贯通新旧、联系中西的要冲地带。

在西门区内,中式石库门建筑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近代历史上,这种建筑构成了老上海数量最大、居住人口最多的建筑形态。一个个石库门里弄分布于上海市区的各个角落,而一排排房屋又构成了一个个独立的空。石库门的前弄是大门,后弄是后门,前后相通。在空间上,通过支弄、总弄和街道相连接。此外石库门的布局和形态又极为相似,因此陌生人一旦进入其中往往摸不清方向。有研究显示,“一大”期间闯入会场的陌生人可能就是法租界密探程子卿,而他突然闯入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因为对树德里内部结构不了解而误入所致(朱华:《巡捕闯入中共“一大”会场新说》)。

由于租金低廉,西门区一带的石库门常常成为外来者来



兴建后的西门菜场